

马克思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论述

杨晓芳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100720)

摘 要: 中华民族能够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顽强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有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和精神特质。在马克思看来,中华民族拥有“刻苦耐劳”“顽强不屈”“独立自强”等民族精神和美德。马克思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相关观点与研究给予中华民族认识自身以极大的启示

关键词: 马克思; 中华民族; 民族精神

DOI: 10. 15938/j. cnki. iper. 2020. 03. 007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9749(2020) 03 - 0034 - 04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针对当时的中国人民对外反对西方列强的入侵,对内反对清朝政府腐败统治的现状,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来自中国的报道及其历史文献,集中撰写了18篇有关中国的通讯稿,表达了对西方“文明”行为的强烈谴责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基于广阔的世界历史理论和独特的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发现“停滞的社会生活”^[1]产生了“规矩的、温顺的、拘谨的中国老百姓”^[2],并由此提出了作为“世界历史的结果”的中国社会运动的未来图景。马克思关于“中国人的民族基因”的历史观,以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解释方式开启了人类理解民族基因和民族精神的新范式。虽然马克思对中华民族精神没有进行过直接、全面的论述,但其思想和观点散见在相关文稿尤其是18篇通讯稿中,而且历久弥新。为此,笔者试图在本文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进行概括和阐释,以发掘这些思想对于认识和分析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华民族精神是由中国生产方式的特点决定的

马克思在考察封建制度时发现,法国是自然形成的,即原生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3];英国是非原生的,第二级的,“导入英国的封建主义,按其形式来说,要比

在法兰西自然形成的封建主义较为完备”^[4]。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欧社会,也属于一种原生的社会形态,但相比其他社会形式,它具有更顽强和长久的特征。马克思揭示了亚细亚社会超强稳定性的秘密,即生产的自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的紧密结合;皇权的绝对权威。这些差别引发了东方社会与西欧不同的历史走向。马克思在这里牢固地树立了民族精神形成的生产方式基础,强调民族精神性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对社会结构演变有反作用。

对于东方社会中的印度、俄国和中国生产方式的差别,马克思认为,印度是以村社制度为代表的生产组织形式,分散而缺乏活力。俄国是土地公有、农村公社和专制制度三位一体的经济—政治模型,私有原则和公有原则的力量均衡,仅属于“半亚细亚”国家,社会稳定性相对中国较弱。而中国则不同,它具有“一切东方运动的共同特征”^[5],即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的特殊性决定了未来中国的社会变革不是仅靠外部的力量就能实现的。由此可以看出,这种自身的稳定内力和保持“自我”的精神特质决定了独特的中华民族精神特性。

关于中国人具有世界上少有的也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令人赞叹的节俭性”^[6]和“特别刻苦耐劳”^[7]的民族特性,马克思第一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特有的生产方式

收稿日期: 2019 - 07 - 08

作者简介: 杨晓芳(1969—),女,山西运城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编审。

进行了分析“为什么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生产出的产品,售价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织出的布更低廉呢?我们上面已经指出过的那种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解答了这个谜。”^[8]同样基于历史的经济动力,恩格斯对中国苦力所表现的极为罕见的极端悲苦状况和刻苦精神也做了揭示,中国人吃苦耐劳、勤俭朴实的精神品格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市场上也得到了验证。在今天的全球创业体系中,世界很多国家都为中国人的勤劳所叹服。这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够实现的精神基础。

马克思把中华民族精神放在人类历史的变迁和世界历史的形成中考察,特别是考虑到了生产与通商对民族精神性的基础性影响。马克思注意到随着鸦片战争而来的是中华民族面对的种种政治、经济、文化的危机,最终导致中国的自然经济开始瓦解,封建专制统治势力日益动摇。根据马克思的理解,被某些西方人认为的中国苦力天生对奴隶身份的认同和拥有狭隘的目光,其根源实则是与中国经济关系相适应的,这些现象会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自然消失。事实上,即使在中华帝国神话没有破灭的各个时期,中国也始终存在着不甘屈服皇权和眼界宽阔的人,他们一路洒播着“中华民族独特精神世界”的种子。

马克思从历史唯物论出发,认为“天朝帝国”失败的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就在于古老中国的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只能维持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将对民族精神的理解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

二、中华民族精神是在反抗压迫和外侵斗争的历史中形成的

在马克思看来,一个民族的精神性会在革命和战争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民族精神性中最深沉、最顽强和最凌冽的一面只有在战争中才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马克思在考察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过程中,揭示了不同民族所表现出来的不同民族精神性。他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指出,在中国的外国人在英国的庇护下欺凌“性情柔弱”的中国人,非法的鸦片贸易以摧残中国人的身体为代价来充实英国的国库,外国人在中国通过行贿使得中国政府失去了进出口贸易的合法收入,那些中国劳

工受到杀戮等破坏条约的恶行,英国报纸讳莫如深,外界一点也听不到。马克思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阴谋后对于近代英国人、俄国人等对华入侵的残暴行为和欺诈本质予以严厉谴责。在揭露欧洲人暴行的同时,他充分肯定了中华民族顽强的复仇精神,对中国人的民族抵抗精神予以坚决的支持。

对于所谓的“文明和正义的”欧洲统治者的真面目,马克思也做了深刻的揭露“每当资产阶级秩序的奴隶和被压迫者起来反对主人的时候,这种秩序的文明和正义就显示出自己的凶残面目。那时,这种文明和正义就是赤裸裸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的报复。占有者和生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中的每一次新危机,都越来越明显地证明这一事实。”^[9]而欧洲文明人对中国野蛮人的侵略,最终也改变不了自掘坟墓的命运。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英国工业空前繁荣的外表下,已经潜藏着深刻的工业危机。尽管有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发现,使得英国的商品和人口得到外流,但市场的扩大终究无法适应英国工业的增长。“这时,如果有一个大市场突然缩小,那么危机的来临必然加速,而目前中国的起义对英国正是会起这种影响。”^[10]马克思既揭示了英帝国主义资本扩张的厄运,也阐明了中国民众在对外来入侵和封建压迫双重矛盾时民族精神的表现。

对于中国人在欧洲人入侵过程中的不同表现,恩格斯有更加鲜明地描述和分析。1857年在《英人在华的新远征》中恩格斯指出“英国人在克服了这些困难和逼近镇江城的时候,才充分认识到:中国军队无论军事技术怎样差,却决不缺乏勇敢和锐气。这些中国军队总共只有1500人,但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11]恩格斯对中华民族抗击外国野蛮入侵者所做出的勇敢精神和牺牲精神表达了最崇高的敬意。

革命与战争并不是中国特有的事件,但是在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帝国主义入侵的斗争中,广大中国人民,特别是受压迫奴役最深重的中国农民表现出无比的英勇、顽强和牺牲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在灾难面前不屈不挠民族精神最集中的体现,这也是中华民族延绵不绝的根本原因,也是未来中国道路所蕴含的特殊的民族品格。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中华民族在起义与抗击外来入侵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顽强民族精神给予极大的赞扬,认为是对人类正义

事业的支持,是对未来共产主义事业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极大信心。在之后的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华民族所表现出来的极大坚韧性和视死如归的不屈精神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巨大力量。

马克思生活在中国发生太平天国运动和鸦片战争的时代,他感受到了中国革命与战争的直接冲击。中国历史上有无数次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军表现出的对极端腐朽腐败的封建统治的反抗力量促使马克思能够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到中华民族延绵不息的精神推动力。实际上,“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就是中华民族不断向前的精神推动力及与反动力进行斗争的“结果”。马克思像客观对待欧洲民族精神一样看待中华民族精神。

三、中华民族精神体现了对独立自强的不懈追求

宗法与道德领域一直是孕育民族精神的孵化器。长期在中国做传教士的捷克耶稣会士严嘉乐(1678-1735)认为“在几千年前,欧洲还是蛮荒落后的地区,而中华民族当时已是世界上最有知识的民族,中国至今仍然比世界其他地方更加文明。”^[12]与许多西方在华生活的外交、商业、传教等人士交往密切的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也谈到:“如果说我们在手工技能上与他们不分上下、在理论科学方面超过他们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人类生活及日常风俗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我不得不汗颜地承认他们远胜我们。”^[13]严嘉乐和莱布尼茨通过大量直接证据说明中华文明在世界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尤其在个人、家庭、社会与国家的秩序修齐治平方面,中华民族具有独特的文化自觉与精神自醒模式。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说到“正如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可是,那些靠纵容私贩鸦片发了大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却逐渐破坏着这一家长制权威——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14]马克思承认中国封建社会父皇对民众的精神统治,但他不同意中国人一律平等的辩解和中国人独立精神的丧失。在马克思看来,君父表达了皇帝和民众不平等,皇帝的官吏的父权则说明了皇帝的官吏和民众也不平等。同时,马克思以大量资料

说明了官吏对家长制的破坏不断引发中国民众对统治者的反抗和追求独立的事实,“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10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15],从而证明,家长制作为国家机器之间的唯一精神联系,它不是广大劳动者之间的唯一精神联系,并不代表中华民族精神性。尽管以吾皇父权为核心的宗法精神长时间占据中国社会主流价值空间,并成为国家机器间的唯一联系,但它并不是支撑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也不是中国人独特的精神世界内容。反之,对抗封建专制的力量始终存在,时刻准备瓦解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并深沉地支撑着这个民族的广大民众不断走向独立。马克思看到了这股力量和这种精神。

马克思1858年在《鸦片贸易史》中专门谈了欧洲人和中国人交往时是如何提心吊胆,“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16]马克思彻底地撕下了欧洲人的虚伪面目。认为“中国人抵抗英国人的武装远征队,毫无疑问地也是有理的。中国人这种行动,并没有破坏条约,而只是挫败了英国人的入侵。”^[17]“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18]等中国人表现出与英国人完全相反的信义、严峻等道德品格得到马克思的赞誉。方志敏等千千万万烈士们的义无反顾、从容就义充分证明了中国人的大义凛然的壮烈精神。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愤然道:帝国主义“他们自认为文明人,认我们为野蛮人,他们是优种,我们却是劣种;他们昂头阔步,带着一种藐视中国人、不屑与中国人为伍的神气,总引起我心里的愤愤不平。我常想‘中国人真是一个劣等民族吗?真该受他们的藐视吗?我不服的,决不服的。’我们相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这时,我们的民族就会无愧色地立在人类面前。假如我还能生存,只要生存一天就要为中国呼喊一天,假如我不能生存——死了,我流血的地方会长出一朵可爱的花来。这朵花你们就看作是 我的精诚的寄托。亲爱的朋友们,不要悲观,不要畏馁,要奋斗,要持久的艰苦的奋斗,把个人的所有智慧才能都提供于民族的拯救。”今天的中国大地,方志敏的理想已经实现,方志敏的精神得到了传

承。今天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处理国际关系之所以从容不迫就是因为秉持了敢于维护世界正义、克己奉公的大义凛然的中国精神。

马克思对近代中国保持着一种“理解的同情”和“理性的建构”,在谴责资本主义侵略的同时也批判中国传统社会的落后,在强调资本主义催生中国现代性转型的同时也对资本主义入侵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而表示同情。马克思认为,19世纪中叶的中国犹如“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只有在接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新鲜空气后,才能通过革命走向新的生产方式。中华民族的自由和独立意识开始觉醒并不是鸦片战争才有,在民族的长期反专制斗争中始终存在,只不过在历史的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显现出来。当然,中华民族独立意识和自主意识要从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沉睡中完全苏醒过来,还需要对父权的民族文化意识和道德生活进行不断彻底地鞭挞与反思。因此,提高全民族的自主意识、独立精神、自由意志和诚中信外是检验中国精神世界优势的关键指标。

结 语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的。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民族精神进行分析,在他看来,民族精神是对社会物质生产的精神反映,是在从事社会生产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主要是指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风貌和精神特征,具有广泛的影响又能激励人们前进。在18篇有关中国问题的通讯稿中,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从中国生产方式出发考察了中华民族拥有“刻苦耐劳”“顽强不屈”“独立自主”等民族精神。马克思关于中华民族精神的观点,既是历史的,又是逻辑的,把中国体现出来的民族精神放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范围内,站在世界历史

的高度进行了充满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已进入新时代,中国正迈步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受到马克思论证的中华“独特的精神世界”,已转化为中国自信的蓬勃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正是传承和发扬了马克思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概括,同时又具有划时代的创新意义,是对当今中华民族精神的最精确科学的阐述。作为世界史的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道路又会随着世界的普遍交往,成为新的世界历史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发展的可鉴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的独特精神世界”也是人类的精神世界,是中华民族对于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548,547,545.
- [3][6][7][8][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91,671,758,759,757-758,690.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89-490.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18.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16.
- [11][16][18] 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恩格斯斯大林作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52,64,91.
- [12] [捷]严嘉乐. 中国来信 [M]. 丛林,李梅,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90.
- [13] [德]莱布尼茨. 中国近事 [M]. 杨保筠,译.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5:2.
- [1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8.
-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3.

[责任编辑:庞 达]